

# 鑲嵌於性別符碼體系的社會資本 生產與運用： 以台灣兩個社區的女性參與為例

陳素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自 Robert Putnam 開啟社會資本有助於公民參與之研究以來，批評者相繼提出應關注其中所潛藏的性別議題，本研究即嘗試以性別觀點，探究台灣社區發展中社會資本的性別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面向：首先，由女性所建構的「內聚型社會資本」，發揮了開啟社區行動的重要基礎，並進一步做為一種再生產性社會資本，促使社區主事者得以建立與縣政府及和其他社區的向外社會網絡，亦即 Putnam 所謂的「橋接型社會資本」。然而，此女性內聚型社會資本，在 Putnam 帶動的社會資本研究中，卻鮮少受到肯認。其次，儘管女性社區志工社會網絡開啟社區發展成果，但社區日常實踐的性別符碼體系，促使社區成員將男性在社區場域中的在場和缺席，都詮釋為一種與女性社區參與相對立的性別隔離，因而形成「詮釋性的社區網絡陰性化」。而此社區網絡的陰性化，也進一步使得女性傾向於將社區的參與網絡，視為有助於個人社交生活與心理健康的私人連繫，而鮮少賦予此行動網絡得以挑戰政府政策與資源結構的公民社會意義。

關鍵詞：性別化社會資本、社區參與、內聚型社會資本、  
橋接型社會資本

##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Social Capital Embedded in the Gender Code System: Two Cases of Wome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Su-chiu Chen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ince Robert Putnam began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engagement, critics have frequently argued for the need to focus on hidden gender issues.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gendered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argues that the gendering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mmunity is embedded in two central aspects. First, bonding social capital, which is largely maintained by local wome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in initiat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onding social capital produced by local women reinforces the reproduction of outward social networks for leaders of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their connection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communities, otherwise known as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bonding social capital maintained by women, however, have rarely been recognized in Putnam-inspired social capital studies. Second, while women volunteers' networks can help spur vibrant community building, the gender-coded system practiced in daily community life often drives community members to interpret men's presence or absence in a manner that solidifies gender separation, thus leading to the interpretative feminization of local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networks. Such interpretative feminization of community networks frequently limits women to viewing their own community networks and participation as contributing solely to personal social life and mental health, rarely empowering them to consider their participatory network as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to addressing and challenging governmental policy and resource structures.

*Keywords: gendering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onding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 一、前言

做為一個學術概念，社會資本可說少見地廣泛被各領域採用，包括在教育、醫療、公民參與、管理、犯罪防治等各領域研究中，皆可見相當數量的相關研究。依據 David Halpern (2008) 的說法，社會資本之相關研究論文是在 Robert Putnam 於 1995 年出版了討論美國社會資本消失現象的論文後，才有了爆炸性增長；然而，無論是在哪一項領域的研究，學者指出社會資本的相關文獻，一直以來都相對地忽略了其中所蘊含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以及其意涵 (O'Neill and Gidengil 2006)。其中 Putnam 引發普遍迴響、主張社會資本促成公民參與的作品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同樣遭到性別政治學者指出，其中的論述明顯缺乏性別觀點：不僅在公民參與定義上，排除且忽略了女性參與行動，亦未進一步闡明與討論不同性別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類型與品質，以及不同性別如何在公民參與行動中，承擔不平等的社會資本累積責任，甚至不同性別如何在社會資本運用中獲益等等重要議題 (Lowndes 2004; Bruegel 2005; Sapiro 2006; Arneil 2006; Alfred 2009; Hodgkin 2009)。

本文旨在從性別化社會資本的分析取徑出發，探究國內社區發展中女性的參與經驗，希望以此經驗，回饋、檢視、修正社會資本之理論建構。其所關注之問題包括：探討特定社區中的社會網絡與互動，如何影響社區發展？社區的社會資本營造，與性別結構間的關係為何？女性參與者如何理解、表述社區網絡中開展的參與行動？其理解與詮釋又會如何影響女性的公民參與等。

本文分為七節，除前言外，首先檢視性別觀點對既有社會資本論述做出的批判與增補，其次分別說明本文問題意識，以及描繪本研究所進行的研究場域與研究資料之取得。第五與第六節，則分別提出「再生產性的社會資本」和「詮釋性的參與網絡陰性化」二概念，以討論在社區參與脈絡中，社會資本的生產與運用如何深刻地鑲嵌於性

別符碼體系中，並指出其中所蘊含的女性不受肯認與受排除議題。最後小結指出前述討論中所蘊含的性別政治意涵。

## 二、以性別觀點檢視社會資本論述

如前所述，社會資本相關研究直至 1990 年代中期才大幅增加。不過，在此研究風潮中，性別化觀點的相關分析相對少見。一直要到 2000 年左右，才有性別政治學者，陸續提出既有社會資本研究中所忽視的各項性別議題，並依此對社會資本論述做出挑戰與批判性增補。

### （一）找回女性主體的社會資本論述

性別觀點分析下的社會資本論述，首先關注到，多數相關研究都將生產、擁有與運用社會資本的人，視為一無性別主體，因此忽略可能存在的性別議題。正如 Vivien Lowndes (2004) 指出：如同政治學的其他概念，社會資本的政治參與研究並不關注性別議題，這導致學者在分析社會資本生產的相關網絡活動時，往往偏重於探究以男性為主導的公民行動，<sup>1</sup> 因而整體而言，社會資本此研究領域，仍以無關性別做為遮掩，而實質上反映的卻是社會的男性本體論 (Adkins 2005)，也因為如此，性別研究者便嘗試將女性主體放入社會資本研究中，進而檢視既有社會資本論述的解釋性：

#### 1. 女性擁有的社會資本

當研究者開始關注女性主體，首先浮現的性別議題為女性與男性社會資本內容之差異。Lowndes (2004) 以英國的研究為例，指出女性的社會資本大多與鄰居網絡相關；Suzanne Hodgkin (2009) 針對澳洲女性的研究則發現，母職角色促使女性有著與男性不同的社會網絡：處於教養學齡兒童階段時的女性，明顯改變其社交活動，例如減少看電

---

1 Lowndes (2004) 以 Putnam 對於義大利個案的研究為例，指出 Putnam 在該研究裏探討的絕大多數都是以男性為主的運動俱樂部，而只有百分之一的地方性健康與社會服務結社。

影等活動，轉而投向與母職相關的社會參與。而 Bonnie Erickson (2003) 針對加拿大進行的性別化社會資本研究也指出，以和不同職業群體者建構網絡的機會而言，儘管女性有著與男性不相上下的網絡建構機會，但女性較有機會與來自不同職業群體的女性建立網絡，而男性則較能與不同職業群體之男性建立網絡。這種男女分別在不同社會領域中建立網絡的相似結論，也出現在 Pippa Norris 與 Ronald Inglehart 的研究中。Norris and Inglehart (2006) 發現無論是美國或針對全球 50 個社會所進行的世界性調查，都顯示在志願結社參與上，確實有著男女性別水平隔離，亦即，男女分別參與不同類型的志願結社，且男性的互動網絡類型較女性可能引發進一步的正式結社參與。

點出女性之社會資本如何不同於男性具有什麼意義呢？承續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討論脈絡來說，區分男、女社會資本類別，其重要意義在於後續引發的公民參與效益。Putnam (2000) 便主張，社會資本可區分為「內聚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sup>2</sup> 前者來自於關注內部凝聚、強調排外之認同與群體同質性的社會網絡，如教會裏的女性讀書會；後者則來自於重視向外發展，強調納入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人們的網絡，如公民權運動組織 (2000: 22)；Putnam 並進一步指出，內聚型社會資本雖有助於人們解決生活難題，但唯有橋接型社會資本才能促進公民參與。

若依循 Putnam 的畫分，那麼這是否意味，大多擁有內聚型社會資本的女性，其網絡建構相對來說較無助於提升公民參與？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如 Lowndes (2004) 所指出，Putnam 及其後續研究雖然肯定了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的關連性，但未清楚回答此關連性究竟在什麼樣的機制下作用與形成。也因此，擅自斷定特定社會資本不利公民參與，可能有貶抑特定社會網絡之參與價值的風險。也因為如此，除分析社會資本內涵外，研究者尚進一步探究女性的社會資本運用又如何不同於男性？

2 Putnam (2000: 23) 強調內聚型社會資本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區分，是一種理想型的分類方式，二者的區別並非為互斥之類屬關係，而毋寧是一種光譜畫分。

## 2. 女性的社會資本運用

概要來看，多數研究都指出女性使用社會資本的方式不同於男性。例如儘管許多研究指出，社會資本有助個人向上流動，獲取經濟資源 (Granovetter 1973; Lin 2001)，但 Maxine Molyneux (2002) 以拉丁美洲的研究為例卻指出，女性往往多運用社會資本協助家務勞動，而非獲得經濟資源。而針對運用社會資本以提升公民參與而言，學者也發現，儘管女性有可能運用社會資本以利於自身政治參與，但卻往往限於參與底層工作的社交網絡，因而少有機會持續向上參與政治 (Lowndes 2004)。Joanna Everitt (2006) 則進一步指出具有現代性別角色取向的女性（在該研究中指未將女性與家庭私領域角色連結之價值傾向），較可能將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之助力。

前述對女性運用社會資本的研究，除指出將社會資本轉化為公民參與之歷程如何受行動者自身意識型態影響，更重要的是，點出社會資本運用效益上的性別差異與限制性，並由此討論凸顯出探究社會資本之不平等議題的重要性。

## （二）性別觀點下的社會資本不平等議題

社會資本中的不平等議題，在 Putnam 帶動的研究風潮中，向來較不受重視，這是因為在該研究所發出美國社會資本正逐漸消退的警告中，社會資本毋寧被視為是一種社群生活的正面資產，因此，後續研究多聚焦在社會資本的公共效益檢證，以及如何提升、促進社會資本等議題。<sup>3</sup>

但事實上，社會資本做為一項資本，即意味著一種資源，而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可能潛藏的不平等自然不應被忽視，其中包括依循族群、階級與性別軸線所存在的各項不平等。

由社會資本生產面向上的不平等來看，Kate Bezanson (2006) 從社

3 但 Alejandro Portes (1998) 很早便提出了社會資本的可能負面影響，包括可能限制社群成員發展機會與自由，過度要求成員服從，以及由上而下形成規範作用、因此限縮多樣性發展等負面結果。

會再生產的概念出發，強調社會資本的形成需要以家庭的再生產勞動做為基礎，而家庭再生產勞動的女性化，便大幅地限制了女性的社會資本取得與利用。這意味女性雖促成社會資本的生產，但自身卻反而難以接近社會資本。而 Ruth Lister (2005) 則指出女性推動的非正式群體行動有助於強化社會網絡，是轉化政治行動的主力，但此貢獻卻往往被忽視。

而即使女性的社會資本生產功能獲得肯定，性別政治學者也提醒道：在讚頌社會資本效益的帽子下，女性可能因而成為國家推諉公共責任下的成本承擔者。Molyneux (2002) 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為例，指出國家動員社會資本的政策內涵中，常預設女性天生適合處理家庭與社區事務，因此往往以女性做為動員目標。這導致拉丁美洲的發展政策，充斥著動員女性承擔解決貧困問題的政策。因此，Molyneux 切中要害地指出，社會資本被認為是一種公共善，但誰決定哪一種社會資本應該被強化，哪一種結社應獲得支持，什麼樣合作規範應該被強調等應該被強調的核心問題，在現行研究中，卻被忽略掉。此忽略背後潛藏著一個與女性權益衝突的社會資本推動之走向。Hodgkin (2009) 對澳洲政府如何以社會資本促進社群福祉的研究也指出，其政策多聚焦於促使女性負擔更多免費的社區照顧責任，使得所謂社會資本效益背後，隱藏著國家將提供的福利責任轉嫁到女性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現象。

性別化觀點的社會資本不平等分析，凸顯出不同性別所承擔的社會資本生產責任、所被肯認的政治參與貢獻，以及所能接近使用的社會資本等皆具有階層性差異。也因為反思了這些性別不平等，故能提醒論者在探討社會資本時，不應忽略分析國家角色。正如 Bezanson (2006) 所說：目前的社會資本理論往往致力於分析有多少的結社行動，卻忽略這些結社所反映出的貧乏治理議題。這也顯示，將性別觀點帶入社會資本研究的核心意義，或許在於改變提問，以及重新詮釋結社和網絡相關現象。

### （三）性別觀點翻轉下的社會資本提問與詮釋

Virginia Sapiro (2006) 曾歸納出性別化觀點所可能啓發關於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的七項提問，而作者以爲 Sapiro 的提問大體來說又可分爲兩大類：

首先、釐清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的各項不平等，故關切以下問題：(1) 哪些社會關係與活動得以且如何生產出有利政治運作的資源？誰可以使用這些資源？(2) 政治資源有限的群體（如女性），如何善用網絡動員且發揮影響力？(3) 社會資本的不平等對女性的政治參與有何影響？

其次，以性別化社會資本觀點，擴大政治參與內涵，因此提出下述問題：(1) 在不同脈絡下，私領域的人際關係如何轉化爲社會資本，進而成爲公領域政治資源？哪些活動所營造的社會資本有重要意義，但卻被忽略？(2) 在探究不同社會資本如何引發政治參與效果時，如何擴充政治之定義？(3) 社會資本的創造可能如何非意向性的提升政治參與效果？此現象與女性的關係爲何？(4) 女性在集體行動中常扮演的觀眾 (spectators) 角色，對於參與行動有何意義？

除了翻轉政治參與提問外，性別化社會資本的觀點，也重新解讀既有資訊。針對 Putnam 指出美國公民參與消退的現象，Dietlind Stolle and Michele Micheletti (2006) 認爲，若從性別觀點來看，所謂參與消退，只是針對傳統參與正式結社進行分析後所產生的結論，然而現今公民卻偏好參與非正式、較不具階層特色的寬鬆網絡，且較可能被展現多樣生活風格的游牧式動員方式所號召。而這種以女性爲主的新參與方式，主要是受社會資本所強調的普遍信任所驅動。因此，其公民參與模式，與其說呈現消退，毋寧說是走向多樣化。

Barbara Arneil (2006) 的研究亦質疑 Putnam 忽略了女性政治參與以及女性運動結社的上升，更重要的是，Arneil 認爲所謂，若進一步探究其成員分析，則結社數量下滑不一定負面現象，甚至可能具有正面民主意義。以美國女童軍 (Girl Scouts) 爲例，該組織自 1990 年代起便重視納入如同性戀等不同文化背景之成員，因此儘管該組織整體人



數下降，但成員中不同文化群體公民的代表性卻是大幅提升。Arneil 認為這說明雖然 Putnam 主張創造社群對民主政治具重要性，但更精切來說，創造正義社群 (just communities) 才是討論社會資本促進民主政治的核心關注。

性別研究對於理解女性之社會網絡如何連結於公共生活參與，提供了新的提問與詮釋。本文受其問題意識啟發，認同其對於前述問題之探究有助於釐清女性公民參與面貌。但於此同時，從社會學的思考取徑來看，本文也進一步主張，若要探究女性建構之社會資本究竟如何轉化為公民參與，那麼除了前述提問與詮釋的翻轉外，也應重視參與行動發生之文化脈絡中性別體制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女性如何詮釋其所處社會網絡及自身參與行動。因此，在以下對於台灣女性的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分析中，將一併帶入此相應觀點。

### 三、台灣社區參與中的性別化 社會資本提問

在探究台灣女性公民參與上，社區參與向來為其中顯著面向。從現行研究結果來看，大致上可將台灣女性的社區參與區分為三個時期：

(1) 國家統治工具時期：李清如(1996)的研究指出，在 1970、1980 年代，國家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以利其統治，因此動員社區女性投入相關工作，以設置「媽媽教室」為主，教導女性承擔起照顧責任。

(2) 女性公民意識覺醒時期：伴隨 1980 年代婦女運動，女性開始在社區發展上展現自主性，邱育芳(1996)與李宛澍(1996)等研究者紀錄了女性跳脫國家體制幫手角色，展現行動主體性所推動的各項社區發展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女性社區參與大多仍以強調環境保護、守護家園等具母職色彩的行動為主。

(3) 女性參與經驗多樣化時期：1990 年代晚期起，女性除了守護環境外，開始參與各式各樣社區營造工作（楊金燕 2002；吳幸蓉

2007；許証揚 2011），甚至擔任領導者（劉美環 2006）。但研究指出，儘管這些參與經驗能使女性充權，但同時也可能存在複製性別角色分工的困境（王惠元 2000）。

上述女性社區參與研究雖豐富，不過多以碩士論文為主，鮮有學術期刊論文，同時也少有研究針對社會資本與女性社區參與之關連性進行探討。<sup>4</sup>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在女性社區參與的研究基礎下，探究女性如何詮釋自身行動的社會資本脈絡，也分析社區中社會資本之生產與使用的性別化現象，進一步探掘並理解女性公民參與的促發機制，或可能存在的性別不平等。

歸納前述討論看來，本文主要受兩個問題意識啟發：一方面、社會資本相關研究指出，社會資本為促進公民參與的關鍵因素，但社會資本內蘊的性別不平等議題，仍有待進一步澄清與分析。而本文尤其關注內聚型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之關連性。因此在分析上，將依據 Putnam 的定義，檢視女性參與者所擁有之相對具封閉性且強調內部凝聚的內聚型社會網絡，與其參與行動有何關連？在本研究中，作者界定有著固定名額、經挑選才能列名，且強調大家一起行善的廟宇廚房志工隊，以及透過練舞所形成一同參與比賽、每週固定共享早餐的元極舞姊妹伴群體，二者皆具前述 Putnam 指出的內聚型網絡性質。另一方面，儘管多國研究皆指出，社區工作多仰賴女性投入，但從性別政治角度來看，仍有必要檢視女性如何在參與行動中展現自主性並獲得充權。因此本研究也將特別關注女性在社區參加與此公民參與的行動中，如何詮釋社群生活與其群體行動。

在這兩個問題意識的指引下，本文透過社會資本分析取徑探究女性公民參與，以增補社會資本性別化的論述。但在提出研究問題前，先必須說明：本文雖嘗試增補社會資本如何關連於公民參與之論述，

---

4 但這並非意味台灣沒有社會資本探究社區參與的研究。恰好相反，2000 年以來，台灣的社區研究圈出版了許多關於社會資本與社區參與的相關研究，包括大規模的社區發展與社會資本關連性調查（黃源協等 2010），以及社會資本如何有助於社區營造等分析（方孝謙 2008；黃源協、劉素珍 2009；陳恒鈞、劉逸雅 2009）；但其中關於性別化的探究，仍付之闕如。

但以下研究只針對公民擔任社區志工的參與行動進行分析，與Putnam所討論的多面向公民參與，有顯著的差距。<sup>5</sup> 但由於社區志工參與是台灣女性公民參與的核心項目，因此本文的研究範圍，雖限制了和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相關研究的對話，但就關注女性參與而言，仍有其重要意義。

其次，關於社會資本定義，學者各有不同主張。Putnam (1993) 早期在討論社會資本對義大利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性時，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組織所具備得以促進協同行動以提升社會效率的各項特質，例如信任、規範與網絡等。之後在討論美國的社會資本變遷時，則將社會資本的定義修正為「一種社會網絡，人們在此網絡中得以發展出互惠的價值與規範」(Putnam 2000)。

但林南 (Lin 2001) 質疑此一定義，他認為前述定義並未指出社會資本做為一種資本，所可能形成特定效益的內涵，尤其不贊同Putnam將透過個人互動網絡所建構的社會資本，與規範與信任等群體資產之概念混為一談，因此主張應將社會資本定義為：「鑲嵌於社會網絡中，可藉由有意識行動加以接近並動員的資源」，以凸顯社會資本一方面乃體現於社會關係而非個體層次，另一方面也強調此項資源的取得與運用仍取決於個體行動，以同時涵蓋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二層次（傅仰止 2005）。

林南對Putnam社會資本定義的批評，可謂呼應前述文獻所指出，Putnam的研究未能指出社會資本究竟如何轉化為公民行動的不足。由於本研究強調社會資本與社區行動之間的關連性，因此採納Putnam定義中所強調社區規範性網絡對促進社區參與的重要；但與此同時，本文重視透過訪談，以瞭解社會資本做為一種得以引發具體行動的資

---

5 公民參與一概念過去在政治理論中常被視為是對於公領域事務的參與，主要指涉政治參與，以及對於公共政策的社會倡議與社會運動等，但這樣的界定被批評排除了多樣的公民參與形式，因此後續討論多擴大公民參與內涵。如，Putnam在對公民參與的討論中便納入了社區參與、慈善組織以及各項公民志願結社之行動。本文在此對公民參與採取廣泛定義，指凡基於關注群體利益（但並不必然與個人利益抵觸）的各項公共事務參與行動。而在本文脈絡中則指涉居民參與社區志工隊、所進行之促進社區生活福祉的各項行動。

源，如何被社區參與者所運用，因此，本文也關注分析林南定義中所指涉之動員此網絡資源的行動。所以，本文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鑲嵌於具互惠規範之社會網絡中，個人與群體可透過意向性行動予以動員的資源。而在此社會資本意涵與前述社會資本之性別化的問題意識引領下，本文提出的具體問題為：

(1) 探究社區之社會資本如何有效轉化為社區參與行動的機制？此機制與性別結構有何關連？

(2) 分析由社會資本促成的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行動歷程中，存在著什麼樣的性別不平等議題？

(3) 探討社會資本促成的社區行動，如何影響女性的公民行動培力？女性如何看待自身社區參與網絡及行動？其詮釋所引用的論述資源為何？社區相關政策與父權體制又如何影響女性的詮釋？

## 四、研究個案與研究方法

### （一）社區個案的選擇

本研究選擇在全國社區評鑑中獲獎的 A、B 兩社區為研究場域。本研究關注社會資本，即意味重視公民由下而上的參與行動，因此個案選擇的依據便不宜片面仰賴國家體制認可，而應關注社區是否存在參與網絡。然而，此參與網絡卻又與社區能否得獎，有某種程度關連。這是因為在現行社區政策下，許多社區都空有形式而無實質行動，遑論參與網絡。

由於在台灣歷史脈絡中，各村里之社區發展協會的推動，源自於執政者在 1950 年代接受聯合國發展策略模式指導之產物，因此操作上充滿國家機器由上而下色彩。即使 1991 年修法，將社區發展協會重新定位為人民志願組織，但成立協會與社區參與二者之間，仍有顯著鴻溝（蘇景輝 2009）。在作者因課程帶領學生拜訪各社區的歷程中，常見空有組織形式之社區；而本研究中的縣政府人員 C1 也表示：有些社區其實只是「拿香跟拜，每次去看，根本都沒有資料」，甚至

有些社區「十幾年來，從頭到尾都沒有開過會」(2014.05.12)。因此，研究者一開始乃從實地拜訪以及與社區實務研究者對話中，找出具定期參與行動網絡的社區。而這些社區也幾乎都曾獲社區評鑑獎項。此吻合的情形其實符合國內研究所指出，社會資本有助於社區發展的成效（方孝謙 2008；黃源協、劉素珍 2009；黃源協等 2010）。

除了鎖定具參與網絡社區外，由於本研究關注社會資本性別化議題，因此亦特意選擇實質負責社區事務者為女性之社區。在前述條件下的名單中，研究者進一步注意到此女性負責人之男性配偶是否積極參與社區的差異，因此選擇了研究中的兩社區：亦即，A 社區的女性負責人之配偶，為該社區理事長，同時也擔任里長。<sup>6</sup>至於 B 社區，雖由女性擔任理事長，但其配偶鮮少參與社區活動，僅在理事長要求時，協助社區進行運送、搬遷等事務。儘管乍看之下，A 社區夫妻共事所帶領的社區發展，似乎較可能受性別結構左右，但後續研究中，我們將看到，即使是完全由女性主事的 B 社區網絡，也同樣受社區中家父長體制的力量所影響。

就區域與人文環境而言，A、B 二社區皆位於中部，A 社區位於中小型都市裏，社區中多為舊式平房或透天住宅，並穿插少數電梯大樓，因此社區裏有 20 年老鄰居，但社區發展前互不相識的居民也相當多。儘管地處都市，但社區中有一廟宇做為信仰中心。B 社區則位於宗族力量依舊顯著的鄉村地區，社區中錯落小型農田，多數人口甚至屬同姓氏。鄉村的人文特色使該區域中原本就有幾處固定聚集的互動網絡，不過，就社區界限內而言，由於省道貫穿社區，因此依據居民的說法，在社區發展之前，省道兩邊居民鮮少互動來往。以下首先概述兩社區發展的歷史：

### 1. A 社區

---

6 村里長與社區理事長是否為同一人，是分析社區發展的重要背景資訊之一，因為許多村里長擔心若理事長活動辦理成效佳，將成為未來選舉競爭對手，因而可能抵制社區活動，導致雙方不合。事實上，A 社區在前任里長任內，便與當時的社區理事長多有衝突。至於 B 社區，理事長與村長雖不同人，但由於該理事長表明無意參選，故雙方合作關係良好。

A 社區的社區發展始於研究者訪談之現任理事長兼里長。里長原經營家族五金工廠，因成功經營里中信仰中心所屬長青協會而踏入里長一職，當時這名里長將該協會立案為人民團體，並大量尋找顧問支持，成功引入經費支援，因而得以大幅提升會員福利，使協會會員由八十多人暴增到近三百人。於是會員開始出現要他競選里長的聲音，在選上里長後，隔年接任社區理事長。但實際運作係由其妻子擔任社區負責人。該社區首先由環境志工隊、爭取興建公園、美化環境等行動出發，接著進一步設立社區關懷據點，推動社區福利化工作。在長期努力經營下，4 年後便在全國社區評鑑中獲獎。

## 2. B 社區

B 社區則是由前任理事長展開社區發展工作。此理事長原本是社區唯一女性理事，但同時也是當地信仰中心廟宇的廚房義工組長，有豐富的辦桌經驗，同時也參與當地農會家政班、婦女會等活動，加上經營雜貨店鋪，人脈互動廣大。在她上任前，社區活動僅限於節日慶祝，但由於她常統籌慶祝活動的辦桌，因此理事們便推選其接任理事長。上任後，她首開社區先例，號召創立志工隊，從縣政府指定補助的髒亂景點美化做起，進而建設涼亭、彩繪造景。兩年後，進一步成立關懷據點。在她期滿卸任後，接任的理事長與幹部也都是她任內所挑選與倚重的幹部。近幾年該社區陸續在縣政府與全國評鑑中獲獎。

## （二）資料蒐集的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以深度訪談為主，參與觀察為輔。作者於 2013 年 8 月與 10 月分別接觸 A、B 社區，表示由於該社區屢次獲獎，因此欲瞭解其社區營造，但也特別說明研究主旨在於女性社區參與。開始訪談前，先陸續參與社區跳蚤市場拍賣、關懷據點供餐等活動，以獲得初步瞭解。研究執行期間至 2014 年 5 月底結束，但考量研究倫理，之後仍陸續拜訪，以約半年時間淡出研究現場。在訪談上，皆分別訪談兩社區負責人、幹部、積極參與之志工，而為了理解社區權力脈絡，也訪談另一位主要權力人物村里長。訪談時間多為一次 2 小時，

有 4 位進行了第二次訪談。另外，由於社區運作與縣政府密切相關，因此也訪談了縣政府承辦人員。訪談對象相關資訊如下：

表 1 研究參與者相關資訊

代稱	擔任職務	性別	訪談時間 (小時)	訪談日期	年齡 (歲)	職業
A 1*	社區實質負責人	女	4	2013 年 10 月 25 日 2013 年 12 月 2 日	46-50	自營商
A 2	總幹事	女	2	2014 年 1 月 12 日	51-55	政府雇員
A 3	關懷隊隊長	女	2	2014 年 1 月 12 日	56-60	護士
A 4	財務長	女	2	2013 年 10 月 25 日	51-55	家管
A 5	志工	女	3	2013 年 12 月 2 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46-50	教師
A 6	志工	女	2	2014 年 3 月 05 日	55-60	家管
A 7	志工	女	2	2014 年 3 月 5 日	66-70	家管
A 8	志工	女	2	2014 年 5 月 12 日	66-70	攤販
A 9	里長	男	2	2014 年 5 月 12 日	46-50	里長、 自營商
B 1	理事長	女	3	2014 年 2 月 25 日 2014 年 5 月 16 日	55-60	自營商
B 2	總幹事	女	2	2014 年 4 月 7 日	35-40	自營商
B 3	關懷隊負責人	女	4	2014 年 2 月 25 日 2014 年 5 月 16 日	50-55	家管
B 4	志工 (前理事長)	女	2	2014 年 4 月 7 日	60-65	自雇者
B 5	志工	女	2	2014 年 3 月 21 日	60-65	家管
B 6	志工	女	2	2014 年 3 月 21 日	65-70	家管
B 7	志工	女	2	2014 年 4 月 25 日	60-65	家管
B 8	志工	女	1	2014 年 4 月 25 日	80-85	家管
B 9	村長	男	2	2014 年 5 月 16 日	70-75	村長
C 1	縣政府科員	女	2	2014 年 5 月 12 日	無資料	公務員

\* 代稱 A 表 A 社區成員，B 表 B 社區

## 五、社會資本生產與再生產的性別化

如前所述，Putnam 主張內聚型社會資本較未能如橋接型社會資本般發揮擴大網絡、增進信任的公民參與效益。<sup>7</sup> 然而，在性別觀點檢視下，此推論能否成立，有必要回到社會資本如何被轉化為公民參與之脈絡進行探究。

### （一）社區發展中社會資本生產的性別化

國內各社區志工參與網絡普遍有女性化的現象，但究竟女性是如何進入社區行動網絡？此網絡生產的社會資本如何被運用？對社區又發揮什麼功能？這些問題，都是過往社區發展與社會資本研究中鮮少回答的：

#### 1. 以女性內聚型社會資本為基礎發展的社區參與行動

A、B 兩個社區能在評鑑中獲獎，其相當數量且穩定參與的志工隊，是核心因素。但分析志工隊的形成，我們會發現，兩個志工隊都不是社區成立後，由從零開始組織形成；相反地，該志工隊都有賴主事者將既有互動良好、但不屬該社區之女性群體引入社區。在此歷程中，既有群體裏的凝聚力牽引著女性加入社區，而她們在群體中建構的內聚型社會資本，也成為主事者發動社區工作的重要基礎，並以此進而組成社區志工隊。

A 社區的志工主要有兩大類：環保志工以及關懷服務志工。其中

---

7 Putnam 的內聚與橋接型區分，主要乃區辨網絡為向內凝聚或向外發展，但若進一步分析，則可發現尚有其他類型分辨，如 Putnam (1993) 對義大利政治的分析，便較為重視公民由下而上自發形成之網絡，以相對於政府由上而下形塑的參與網絡。而林南 (Lin 2001) 則指出應從垂直與水平的區分，辨識網絡能否接觸較高階層位置的行動者。此網絡的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以及網絡連結的垂直與水平區辨，皆有助於我們討論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之關連。以本文案例來看，內聚型網絡的凝聚力，提供了由下而上參與網絡基礎，但如同後續所將提及，社區的發展仍有賴主事者建立向外的水平網絡與向上網絡以獲取多方資源。各種類型網絡的交互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究，惟本文此處乃聚焦於內聚型社會資本是否較無助於公民參與之論辯。



關懷志工的服務時數較多，<sup>8</sup>且幾乎全數身兼環保志工，因此成為 A 社區高度付出的重要成員。這群志工其實來自於一個已經共同跳元極舞十多年的女性群體。一開始是因為群體的成員 A 3 接受里長邀請，加入環保志工隊，參與掃街工作，接著在 A 3 號召下，其他成員便一起加入，之後進一步組成關懷服務隊，A 3 也成為其隊長。<sup>9</sup>

至於 B 社區的志工隊也包含環保志工與全體身兼環保志工的關懷志工。該志工隊的形成，亦同樣來自先於社區存在的初級群體，亦即該社區所在鄉鎮之信仰中心寺廟內的全女性志工群體。這群女性志工過去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都在寺廟廚房擔任供餐給進香團的工作。2004 年時，廚房義工組組長 B 4 接任社區理事長一職。當她決定申請政府補助美化髒亂景點時，便動員這群女性，成立志工隊。當時 33 名寺廟志工全數加入，開啓 B 社區的社區發展。而這 33 人至本研究進行時仍全數持續為社區志工。

無論是 A 社區元極舞群體或 B 社區的寺廟廚房義工組，皆不僅互動密切，且成員相對固定，尤其寺廟義工組更受寺廟規定，為固定名額 33 人，故明顯屬於 Putnam 定義的內聚型網絡。這樣的初級團體之所以願意參與社區，一開始皆源自於群體內聚力。如 A 7 會參加志工的理理由單純就是「XX（指 A 3）就招我們這些運動伴一起掃公園啊，我們就一起過來」（2014.03.05），A 6 也形容：「那時候大家跳元極舞跳得很和好這樣，跳完以後大家都一起吃早餐，就像姊妹一樣啊」（2014.03.05）。B 8 也說：「阿 XX（指 B 4）就在叫啊（台語：指邀約），我們就跟著一起做」（2014.04.25）。

這種密切互動的內聚型網絡，內蘊可觀的集體動員潛力，上網絡內部規範便是他們成為社區第一批志工的核心因素。尤其 A 社區更展

8 環境志工一個月服務一至二次的掃街工作，而關懷志工一個月則固定服務三次，其中兩次為外展服務，亦即到長者家中量血壓、問安，一次則是在關懷服務據點提供長者多樣課程服務。

9 目前 A 社區的關懷服務隊共四組，其中三組成員主要來自此元極舞群體，而唯一的非元極舞小組，其成員則彼此為親屬，此再次印證社區參與由初級團體為基礎開展的現象。

現此力量的自主性：當我一開始知道這群女性志工，原為元極舞成員時，只是讚嘆她們能將練舞培養的集體行動力，轉化為社區服務力量，但進一步瞭解後，令我吃驚的是，這群社區關懷志工的主力成員，竟然大多數並非A社區居民，半數以上是附近其他三個社區的居民。但這絲毫未阻礙她們共同參與A社區的工作。這說明其內聚網絡之規範力量的自主性，得以超越國家行政區劃分體制之限制。<sup>10</sup>

兩個社區志工班底，都來自於女性內聚型網絡之現象，說明內聚型社會資本不必然如 Putnam 所說較未能發揮公民參與效益。但加入社區志工，只是參與行動的開始。參與社區後，原初級群體封閉、內部的取向認同，如何轉化為社區認同？二者是否抵觸？由兩個社區的經驗來看，儘管內聚性社會資本為動員基礎，但後續的公民行動實踐，不僅帶動其他居民參與，並且創造出橋接型網絡，同時也改變行動者的群體認同內涵：

## 2. 由內聚型網絡出發建構橋接型社區網絡

當既有初級群體被引入社區時，不僅群體本身對社區感到陌生，社區民眾當然也缺乏與此群體的互動基礎。但持續穩定的服務行動，<sup>11</sup>

10 這群由不同社區居民組成的女性元極舞群體，已經在A社區服務4年以上，但事實上她們之前便曾經因為1位成員認識鄰近另一社區理事長的緣故，在該社區擔任環境志工長達6年。直到原理事長卸任，新任理事長與此群體缺乏網絡銜接，且無意願經營環境志工，才停止運作。由此可知，此跨社區參與現象過去便已存在。此現象可謂呼應台灣社區所主張：社區劃分的核心應在於社區認同與社區意識，而非過於遷就既有行政區域（吳明儒、陳竹上 2005；邱昌泰等 2002）。

11 這也說明，即使有內聚型網絡作為行動開端，但後續要能持續參與，仍有賴主事者有效經營。A、B兩社區各有其相同與相異經營之道。A社區的志工經營主要為帶頭示範與提供福利。經營者在清理家園時總率先動手做。理事長向我強調帶志工沒別的，就是要自己也下去做，他說如果帶頭的人只會出一張嘴，那很快就會「了尾去啊」（2014.05.12）。另外，該社區也建立點數制度，志工的服務可累積點數，在社區活動時折抵現金。其次，理事長也十分擅長引入資源。例如理事長最為人誇讚的作為就是興建公園。而此項建設便是向縣政府爭取景點營造經費，並動員各界人士說服空地地主出借荒蕪已久之空地。此外，理事長也常邀請贊助，使社區活動規模明顯較為盛大，讓居民產生以社區為榮的認同感，這一點在居民常跟我說「阮的擺比別人卡大場！」的對話中清楚可見。不過，拉贊助當然並非無成本，談到該還的人情時，理事長說：「這就是人家說的作大損角（台語：意指擔任要角無可避免要有所付出）」（2014.05.12）。至於B社區的前任理事長也一樣強調帶頭做，但此社區有另一項特色，便是十分擅長用食物跟志工、居民們聯絡感情，這種以共食方式聯繫社區互動的經營方式，仍持續運作。其次，B社區在社區營造前就有各聚集點，而志工負責人B3不嫌麻煩地採走動式服務，將社區服務帶至各聚集點進行，也讓居民更具社區意識。至於在引入資源上，此社區也以烘焙為主打，向縣政府申請多樣烘焙硬體設備。限於主題與篇幅，關於兩社區之領導特質與經營策略僅於此簡要說明。

讓社區網絡逐漸得以建立。A 6 就生動描述剛開始挨家挨戶進行關懷服務時，所感受到社區居民的高度懷疑，到現在彼此密切互動的過程：她回憶她們一開始也因為陌生感到退縮，要靠彼此壯膽才敢跨出第一步。「你自己一個人不可能跑來說：我要跟你們做這樣（指進行關懷服務），你不敢講嘛！也歹勢啊。我們這種就是整群找出來，大家想說好玩，一起找出來做，大家都有伴啦」。但同樣地，受訪家戶對志工也多有疑慮，甚至前兩戶就連續予以拒絕。「我們頭一站就是要來從這裏做，她們就說：不用不用。我們就很歹勢，歹勢到後來，去別戶問的時候，就都很歹勢歹勢」。縱使接受服務的住戶，根據 A 6 的形容，也是「都怪怪的」，所以在量血壓、填寫資料後，便迅速結束訪問。但服務工作持續四年多之後的現在，A 6 形容：「一開始都比較沒話講，寫一寫就走了，在做比較快。所以我們那時候 3 個小時二十幾戶就可以做起來了。……現在不一樣，現在都有在聊天，有的人還會準備點心給我們，就都做不完，所以現在只好分成兩個路線在做」（2014.03.05）。

A 6 描述的熱絡互動，同樣出現在 A 5 與 A 7 所參與的不同關懷志工組別，我們可以看見既有的內聚型網絡，在與居民互動中，轉而共同建構出擴大的社區互動。雖然關懷服務不是社區工作的全部，但也足以體現出 A 社區整體信任的逐漸提升。<sup>12</sup> 志工自身，雖然一開始是以「一起跳舞吃早餐的姊妹伴」身分出發，但在持續行動中，也產生新的社區公民認同。言談中，她們常流露以 A 社區蓬勃發展為榮，也不時以社區公民身分比較、評價附近幾個社區的發展內容與成效。<sup>13</sup>

12 此社區互動網絡，在社區評鑑到訪當天，具體展現為可動員的社會資本。A 1 告訴我，正因為居民的熱烈參與，甚至有居民刻意請假不上班，大獲評鑑委員好評，才讓既無社區產業，也無名勝古蹟景點的 A 社區，得以跌破眼鏡獲得全國優勝。不過，當天的盛大場面，還來自於其他社區的協助，而這也與女性志工網絡有關，這一點後續將進一步討論。

13 A 5 在訪談中侃侃而談，指出「XX 社區都沒有什麼活動，唯一活動就是去吃東西，因為她們的手工皂產業賺很多錢，就會請老人吃東西，就這樣子而已」（2013.12.02），A 7 則說：「我住的 XX 里，就只有元宵跟中秋節在辦活動，然後就租土地公廟樓頂晚上在唱歌，其他就沒辦什麼特殊，算在起步而已。這裏比較認真，……開很多班（指關懷據點的課程）」（2014.03.05）。

而 B 社區的景點改造行動，提供了志工們與更多居民互動的場域。加上不同於寺廟義工隊有名額限制，社區的景點工作乃開放志工加入，因此多數志工都發揮自己本身網絡的動員資源，陸續邀請更多人參與。於是 33 人爲基礎的志工隊快速擴充至一百多人，因而發展出社區行動網絡。而一連串行動更帶動居民社區意識，「社區」從一個陌生名詞，轉爲居民熟悉的概念。就像跟著鄰居加入志工隊後，常忙到忘了回家煮飯而被先生叨念，卻仍持續參與的 B 5 就說：「以前人家在說社區、社區，我也不知道社區生成啥米款？」(2014.03.21)。而原來以寺廟志工身分加入社區的志工們，也意識到社區推展各項工作後，居民們互動增加、彼此更加熱絡，因此即使最初號召成立志工隊的 B 4 由理事長卸任後，這群志工並未停止參與社區。如同 B 6 所說：「廟的事情要做，社區的事情也要做啊！」(2014.03.21)

正如 Lowndes (2004) 所指出，Putnam 對於不同類型社會資本的優劣畫分，往往無法適切地解釋社會資本如何促進公民參與的實際樣貌。而 A、B 社區中由女性內聚型社會資本爲基礎開展的公民參與，透過持續參與建構出社區橋接型社會資本的歷程，顯示社會資本在公民參與歷程中可能產生類型之轉變，而這也意味著，唯有扣回實際行動脈絡分析，才得以發現社會資本之於公民參與的轉換面貌。

## （二）社區社會資本之再生產的性別化

儘管有女性內聚型社會資本做爲社區發展的發動基礎，但社區要能擴大發展行動，並在全國評鑑中脫穎而出，仍需其他社會資本挹注。A、B 社區的經驗顯示，除了居民參與外，還需要三項社會網絡：首先，須與當地商、政界菁英交好，以爭取經費贊助；其次，須與縣府相關處室互動良好，以獲得評鑑推薦與相關重要訊息；最後，還須與鄰近社區交好，彼此支援活動參與人數，以利評鑑。此三項網絡都需要主事者費心經營，但進一步細究，則可發現，除與商、政界交好外，與縣政府及鄰近社區的網絡建構，都和以女性爲主的社區志工隊密切相關。

從社會資本的生產來看，儘管社區對外的網絡經營是由領導者所發動，但其實際運作卻仰賴女性志工的投入，亦即藉由志工的付出，社區主事者才得以建構與其他社區以及縣府間的互惠網絡，本研究稱其為「再生產性的社會資本」。

### 1. 社區與縣政府建立互惠網絡所需的再生產性社會資本

縣府與社區間的關係，乍看之下似乎在於活動經費補助，但事實上，由縣府而來的補助數額，多已由中央政府部門限定。而由縣府決定核給的項目，則往往是由民意代表協助發文爭取的經費。亦即，若該社區交好的民意代表與縣府關係良好，則補助金額較高。<sup>14</sup>由此看來，與民意代表的關係經營，最有助於爭取縣府經費，而這也反映出社區行動如何鑲嵌於地方政治脈絡。<sup>15</sup>

14 A9 就不諱言地告訴我在爭取縣府的經費補助上：「這是有分大小項（台語），XX 黨的就是 3 萬，XX 黨的搞不好就是 1 萬。」(2014.05.12)。

15 社區發展協會為了爭取更多資源，無可避免要與地方政治權力打交道。A9 在談到爭取社區資源與政治人物交好的關連性時，便說道：「其實對政治人物，你是一定要摺注（台語，指押賭注），就是，反正你就是要靠邊站，要不然很難做事情」，因此即使他為無黨籍，但由於社區內住著連任多次的國民黨議員，所以他也承認「我接觸的人是國民黨比較多，我們欠人情的人也是國民黨比較多」。對他來說，較苦惱的是，當國民黨內不同派系同時分別要求幫忙時。尤其該縣市在 2014 年選舉時，國民黨內出現互不相讓的競爭人選，更是讓他疲於奔命。但為何雙方皆欲拉攏他呢？依照 A9 所說：「像我們這，說實在的不是臭屁，辦得比較好的社區，都比較多人要來拉，所以都會造成很大的困難，他也要頭給你戴著（台語，指拉陣營，並加以牽制之意），他也要給你拉著，唉，其實很累，然後現在我又兼任西區里長聯誼會的會長……就很麻煩」。加上他自己也要競選里長，因此更覺困難。至於 B 社區理事長 B1 本身參與國民黨婦女會，社區內也住著連任多屆的國民黨民意代表，因此與國民黨關係相當良好。且由於社區服務在居民間有著良好口碑，所以最常與村民互動的 B1 與 B3 在選舉時，便被要求一起出面拜票。說到與各方政治人物周旋，依據 B1 的說法：「我們比較不會去針對黨派，所以只要我們能出面的，我們就出面啦，我是人人好啦」，不過，所謂人人好並非真的無黨派意味，因為 B3 便告訴我：「我們這裏不會有民進黨的來叫我們去幫忙啦」。由此可看出此社區被定位為傾向國民黨。那麼如何面對國民黨內不同候選人呢？B1 就說：「……可是當然，我們也要自己去分析說，他對我們的心在哪裏……比如說我們辦活動，這個人是不是都會來關心，會來幫我們爭取經費啦……有的是選舉才來的，那我們就又不一樣了（指幫忙的程度不同）」，不過，不同於 A9 的四處周全，B1 與政治人物交好，相對有所保留，她說：「我比較不愛去叫人捐錢什麼……這樣改天選舉的時候我們就難那個，他會想說你和我討經費、討贊助，我都有給你，你怎麼選舉沒有幫我的忙，這樣做社區會做到人情還不完」。在觀察二社區活動時，也發現其政治人物贊助量有明顯差距，這與 B1 無任何參選規劃應該也有關連。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底選舉後，該縣市轉由民進黨執政，但與二社區交好的民意代表也都順利當選，2015 年年初，我拜訪 B3 與 A1 時，她們都表示既有經費都是選舉前核定的，因此仍看不出選舉影響，而有待後續觀察。前述地方政治權力明顯影響社區經營，不過在二社區與民意代表互動上，較未見性別化相關意涵，限於篇幅，因此未進一步討論。

不過，縣府與社區之間其實還有很多互惠關係營造。在參與觀察和訪談歷程中，我很快就注意到，社區志工常參與縣府各項活動。舉凡園遊會、頒獎會場、慶典活動、政策宣導記者會等種類，項目繁多。進一步詢問，才發現這些活動背後交織的是縣府各處室與社區的互惠性網絡。

由於縣政府雖是社區指導者，但本身也是政策執行單位，因此在相關政策活動推展上，無論是人氣與場面的創造（如縣府舉辦園遊會需要各社區設攤），或是活動執行成效上（如舉辦話劇比賽需各社區報名參加）等，都十分需要社區人力的贊助與投入。縣府人員 C 1 在訪問中就直言：「我們當然需要找一些執行力比較好的社區來配合啊！」(2014.05.12)。而這些配合工作的執行端其實就維繫在社區志工網絡中。A 1 就略帶無奈跟我說：「常常就會接到電話（指縣政府各科處）說：啊，XX，明天我有一個記者會，你可不可以幫我出動 30 個志工。我說：噯，你明天的活動，你現在才跟我講喔？那我也是跟他說：好啦，我儘量」當我進一步詢問 A 1 縣府要求，要如何拿捏跟決定是否配合時，A 1 說：「幾乎啦，幾乎都會答應啦」(2013.12.02)。同樣地，B 1 也告訴我：「縣政府裏面的各個科有時候有一些需要社區作的業務，就會去打聽說找哪個社區比較好？人家就會跟他說：可以找 XX（B 社區的名稱）啊，那如果他們就有在叫了，能去的話，我還是會儘量去」(2014.02.25)。但 A 1 與 B 1 兩位社區負責人，之所以能儘量回應縣府的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社區中有高動員性的志工網絡。A 1 會打電話給各志工組長，請組長們動員組員。而 B 1 則是詢問負責聯絡志工的 B 3，由 B 3 確認可動員的志工人數。<sup>16</sup>

16 B 3 負責該社區的志工聯繫。她不僅熟記多位志工電話，性子急的她，如果電話一時聯絡不上，常常摩托車騎了就直接到志工家中，因此，社區中常見她的穿梭身影。儘管志工中有男性，但被動員的志工幾乎都是女性。B 3 在形容此志工動員時，就說道：「需要的時候，我就要去圍（台語，ㄅㄨˊ）啊，要去叫歐巴桑。」由此可見動員網絡的女性化。我曾問 B 3，一般來說大約可以叫到多少人？B 3 頗豪氣地說：「隨便叫也是一定有三、四十人啦」(2014.02.25)。而當 B 3 跟我聊到她帶志工去縣府場子擺攤時，我問她生意好嗎？賺得到錢嗎？她立刻回答：「沒賺到錢的我們也是去挺啊，這樣啊，我們就想說，你如果不去，下次人家怎麼會挺你呢？我們就是那個出發點，大家互相啦，所以不管做什麼的話，他們（指縣政府）都會第一個想到我們啦。」(2014.05.16)。

這種長期下來的互動關係甚至會在縣府各處室間擴張，亦即，除了業務與社區發展直接相關的科處外，其他處室也會耳聞這類「配合度高」的社區，而前來尋求合作。所以，A 社區就代表了該縣市環保局參加全國比賽，B 社區則代表該縣性別平等組織參與全國話劇比賽。這樣的高度配合當然也為社區帶來特定好處，就如同 B 社區主事者之一 B 2 所說：「好處一定會有啦，像現在有些補助都要求有參加過研習，那這種重要的研習公文，我們大概就會在很前面就知道這些消息」(2014.04.07)。<sup>17</sup>

對社區主事者來說，這種與縣府互惠網絡的建構，對社區發展有著高度重要性，而此網絡建構其實有賴志工投入。在支援縣府過程中，社區志工本身並未建立起與縣府的網絡關係，但志工形成的可動員網絡，卻是社區主事者與縣政府互惠的基礎，因而有助於再生產出社區與縣政府之間的橋接型社會資本，也因此我稱其為「再生產性社會資本」，意即具有生產出社會資本功能的既有社會資本。

## 2. 社區與其他社區建立互惠網絡所需的再生產性社會資本

各社區面對評鑑時，彼此難免有競爭關係，但弔詭地是，社區要在評鑑中脫穎而出，也必須與一定數量的社區維持互惠關係。原因在於當各社區在評鑑中呈現自身社區活動成效時，場面的熱鬧以及居民參與程度是評鑑委員非常重視的一項指標。在這樣的評鑑方式引導下，與鄰近社區的互惠便顯得十分重要。

位於都市的 A 社區由於與各社區距離近，合作關係尤其密切，為了維繫這種合作關係，各社區在舉辦重大節慶活動時，甚至會刻意錯開時間，以便相互支援，讓活動場面熱絡好看。A 6 便提及到其他社

17 此縣府與社區的密切合作，也同時引發一些行政部門緊張關係。理論上，與社區直接相關的應該是市（鄉）公所，因為各項業務發文，或受推薦參加社區評鑑，都是透過公所。因此，當縣府為了業務方便，越過公所找社區合作各項活動時，便會引發公所以及市議會或鄉代表會的不快，尤其當縣府委託社區辦理的活動中牽涉大筆經費時，這種不快會更明顯。縣府人員 C 1 就提到曾有公所人員向縣府抱怨說：「阿就直接你們縣府跟社區去做就好了啊，就不用我們公所了嘛！」公所的抱怨對縣府人員當然不構成壓力，但社區則必須謹慎面對，以維持關係平衡。(2014.05.16)

區支援的經驗：「因為我們社區有爆米花機器，其他社區喜歡跟我們里長借，啊借的時候，不是只借機器喔，是連我們負責爆米花機器的志工也全部一起借過去」(2014.03.05)，A 3 也說：「別的社區需要人的時候，我們志工就要出去幫忙啊……我們就是去充場面」(2013.12.02)。在描述這種社區彼此支援時，社區裏有一個常見用語稱為 *ou-en*（日文「応援」的發音，意指支持、奧援）。在我去過幾次 A 社區後，就發現領導者、幹部與志工等談到社區工作時，常提到：「攏碼礙到 *ou-en* 啊（台語）」，顯示出此互相支援的頻繁。而這些平時 *ou-en* 中所累積的社會資本，在 A 社區的全國評鑑時，便發揮具體功效。評鑑當天，除上一節提及居民的共同熱烈參與外，A 社區領導人還邀請了鄰近社區的班隊共同參與表演，根據理事長回憶：他邀請附近的南管隊、北管隊、獅陣、龍陣以及電音三太子等共襄盛舉，使得場面熱鬧非凡，也因此大獲評鑑委員好評。

B 社區的志工也同樣擔負支援其他社區的工作。例如，他們曾經在友好社區舉辦千人 CPR 活動時，前往支援。該社區的總幹事就說：「他們一個社區怎麼可能有一千個人出來一起作 CPR，很多人要上班啊，所以我們就去湊人數，我們的阿婆還有被叫上去，還被電視台訪問喔！」(2014.04.07)

如同前述社區與縣政府的互惠網絡一般，這群以女性為主的志工隊，也同樣是社區主事者與其他社區互惠網絡建構的重要投入者。志工們對其他社區的支援，並未增加個人社會網絡，但志工們彼此互動關係良好、所以願意一起去幫忙的網絡力量，卻再生產出社區主事者與其他各社區領導人之間的互惠網絡。

透過分析 A、B 二個社區的參與網絡，並指出其社會資本之生產與再生產的女性化現象，本研究針對前述 Putnam 理論提出兩項修正：首先、女性的內聚型社會資本不僅可能啟動社區參與，並且在參與歷程中，亦進一步促使社區網絡與社區認同之形成；其次，在社區發展工作的推動中，與外部組織的互惠支援，是社區獲得資源的重要關鍵之一。這意味社區中存在著隨時可動員的人力資源網絡，深刻影響著



社區發展的推動，而以女性為主的社區志工，便往往在此動員中，發揮「再生產性社會資本」之作用。如前所述，本文的再生產性社會資本意指具有生產出社會資本功能的既有社會資本，而作者之所以由社會資本的功能角度切入，提出此一概念，乃意欲透過此概念進一步分析貢獻此功能的社會資本建構者是誰？能夠獲益於再生產出之社會資本的又是誰？藉以檢視社會資本運用中的不平等議題。研究中女性志工所建構與擁有的社會資本，具有再生產出自身鮮少能運用的橋接型社會資本之功能，但正如家務勞動對於市場勞動之再生產勞動貢獻往往被低估一般，此一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貢獻，也往往被忽視。<sup>18</sup>

從探究社區行動網絡中，揭露出兩社區社會資本生產的性別化之後，社會資本的性別化觀點，也引領我們進一步探究這些女性志工如何運用、詮釋社區網絡中的社會資本。

## 六、詮釋性的社區參與網絡陰性化

要理解女性如何看待社區參與網絡，我們首先有必要回到參與行動的互動框架中，分析參與者的生活如何關連於其所參與的社區網絡。

### （一）社會資本的心理福祉效益

從志工對參與經驗的分享，我們首先注意到社會資本為女性帶來的正面生活效益。在兩個社區中，多位女性志工都提到「有出來跟大家這樣講話、聊天，日子變得好過很多！」這類言論。乍聽之下，此說法或許讓人誤以為女性是透過擔任志工打發時間。但事實上，有多位女性志工或者在職，或必須承擔繁忙的家務。像 B 7 要照顧身體不

18 這裏的再生產性社會資本，不同於 Bezanson (2006) 提出的社會資本再生產，Bezanson 指出的是社會資本之形成需要以家庭再生產勞動為基礎，而再生產勞動的女性化，卻限制了女性對社會資本的取得與利用。而本文強調的是女性所建構與擁有的社會資本，被用以生產出自身鮮少能運用的橋接型社會資本。然二者概念雖不同，但皆蘊含性別不平等議題。

好的先生、帶孫子，還要負責煮三餐給上班的兒子、媳婦，但她仍堅持抽空參加關懷志工，有時甚至必須帶著孫子的娃娃車到志工工作現場，一邊幫長者量血壓，一邊照顧孫子。B 7 的先生不只一次抱怨說：「你需要把自己弄得忙成這樣嗎？」但 B 7 總是說：「是我在做，又不是你在做，你就不要管我啦」(2014.04.25)。

參與社區帶來心理效益的例證，在兩個社區志工訪談中多次出現。如 A 3 的護士工作並不輕鬆，但因為覺得參與社區可以交到不少朋友，因此仍積極參與，而 A 5 與 A 6 都透過參與社區，緩和了親人過世後須重新適應生活的心理壓力。B 7 在訪談中則一再向我強調，志工們一起工作、說笑，會讓日子「加足……（加強語氣）好過ㄟ」（台語），強化的語氣清楚表達她在社區網絡互動中獲得的心理滿足。B 3 的志工參與更是對其生命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處於空巢期的 B 3，過去對於先生常往外跑、不肯在家陪她，充滿怨懟，因此只能將心力完全投注在賺錢上，長期下來，身體跟心理都出狀況。後來在生病休養期間，偶然受理事長邀請協助文書工作後，便一頭栽入社區事務。現在的她不只身心狀況大幅改善（她笑說現在社區的人都形容她是「日本製的」（台語：意指品質好、堅固不易壞），甚至克服困難，從頭學習電腦，成為 B 社區參與者中極少數會電腦的人之一，因而對自己產生莫大肯定。

過去忙著賺錢的 B 3，根據她的形容是連隔壁鄰居有誰都不大知道，但現在卻是熟記眾多志工住家、電話的社區核心聯絡人。她從 2008 年開始參與社區，一路走來並不輕鬆，尤其從零開始學習電腦，更讓她吃足苦頭。她說一開始央求女兒教她電腦，但教了兩次，學會開機、開文件檔以及嘗試打字後，女兒就常敷衍、拖延說：明天再教你。她只好下決心自己摸索。她曾談到一個摸索歷程中的小故事，讓我印象深刻，剛開始學打字時：

有一次後，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把注音輸入弄不見了，打出來都是英文，我女兒又出門不在家，我為了要切換回中文輸

入，從八點多，一直對著電腦到處亂按、亂試，後，就這樣一直試到快凌晨兩點，最後太累了只好放棄。

類似這樣的挫折，不斷發生，但沒阻礙她學電腦。現在關於打電腦，她擔心的只有：「你知道嗎？老大人會流眼油ㄟ，所以我現在最多都大概打到十二點多，就沒辦法做了」(2014.02.25)。參與社區後的身心重大轉變，甚至讓 B3 甘願放棄全職工作，改為兼職，以便投注大量心力於社區。對於收入大幅減少，她自己形容：「以前還會想說一個月要賺多少錢，還會算一下，現在都沒有在算了，反正皮包裏面的錢，都不會少啊，因為都沒有去逛街了，不會花錢」(2014.02.25)。正如 Putnam (2000) 指出，社會資本在健康與幸福領域中所顯示的影響與重要性，遠勝其他領域，這些女性志工的經驗便印證此說法。

儘管有著前述效益，但回到社會資本促進公民參與的脈絡來說，社會資本帶來的重要助益，在於以社會資本形成的公民力量與觀點重新思考公民與政府的關係，並向政府提出需求，同時公民也在此歷程中發展對公共議題的關心及參與能力 (Putnam 2000: 338)。從前述討論，我們已看到女性志工與社區社會資本生產息息相關，而對照 Putnam 的社會資本效益討論，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詢行動者本身如何看待此網絡建構，又賦予自身行動什麼樣的詮釋？

從觀察與訪談中，本研究發現，儘管實現了多項社區發展實質成效，但社區女性志工卻鮮少對其集體行動賦予公共事務意涵，志工們幾乎不會討論政府在社區相關公共政策的責任，或是審視社區工作應如何增進居民生活福祉。相對地，志工們傾向於將志工網絡解釋為女性一起服務，相互有伴、增添趣味等。此現象某種程度呼應了女性公民身分實踐相關研究所指出：許多女性社區參與者不願意將自身行動詮釋為政治行動從事，因為他們認為政治屬於腐敗領域 (Ackelsberg 2005)；又英國社區公共照顧服務的女性，傾向於將自身行動詮釋為擴展家庭角色，而非參與社區活動 (Lowndes 2004)。那麼，本研究中的女性參與者為何不採取參與公共事務的論述來詮釋自身行動呢？細究

其原因，其背後結構因素，即社區中透過日常生活世界不斷被操作、實踐的性別符碼體系。

## （二）社區參與行動中的性別符碼實踐

由統計數字來看，台灣多數社區皆存在「志工多為女性，但領導者多為男性」這種分工上的性別隔離 (gender segregation) 現象。<sup>19</sup> 由此看來，社區是一個體現傳統性別意識型態的場域；但值得玩味的是，進一步去探討社區互動以及參與者的自我詮釋時，我們發現，社區的參與網絡不僅存在參與者多為女性的女性化現象，更被參與者賦予陰性化詮釋。

所謂陰性化 (feminization) 意指具備性別符碼體系中的陰性特質 (femininity)。此陰性特質與生理上的女性未必有關，而是社會體制所建構、賦予女性特定屬性之符碼體系，例如，細膩、依附取向、照顧等特質，在許多社會中都被建構為陰性特質。更重要的是，此陰性特質往往被界定為與陽性特質 (masculinity) 二元對立，並藉由這種畫分，強化其屬性上之對立及區別。

本研究顯示，當參與者談及社區網絡的各項互動與屬性時，往往運用此陰性／陽性有別的性別論述，賦予了社區陰性化特質之詮釋，並同時強調其中陰性與陽性之二元對立。即使女性是社區事務實際領導者，亦即女性得以某種程度突破既有性別體制限制的社區場域中，由性別符碼體系所支撐的性別對立與隔離依舊存在。

### 1. 社區男、女分工的性別化詮釋

前述指出，A 社區的理事長與里長為同一人，且里長確實透過與民意代表以及其他政、商界人士交好，而爭取到社區經費。但社區志工的管理、課程與活動的安排，以及與縣府的聯繫與合作等，都是理

19 社區發展的參與志工多數為女性，但理事長卻大多為男性。以台灣的 2014 年的資料為例，全國的 6,761 名理事長中，只有約六分之一為女性 (1,160)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5)。

事長的妻子 A 1 所負責。我在參與該社區義賣活動以及大型晚會活動時，都看到 A 1 現場指揮調度志工，確保活動進行順利；而與縣府科員聯繫、對談，甚至在該縣市的社區發展研討會，提到 A 社區時，其他社區負責人及參與社區實務的學者都會立刻提到 A 1 的名字。由此可見，A 1 無論在對內經營或對外聯繫上，都是實際負責人。然而，當我與 A 1、里長 (A 9) 以及社區幹部、志工訪談時，談到社區事務分工，大家卻都口徑一致地說：里長負責外面的事情，A 1 負責裏面的事情，或直接說：「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啦！」

針對這個被一再提出的分工詮釋，當我進一步詢問什麼是外面、什麼是裏面的事情時，最常見的回答有：里長必須跟廠商與民意代表交陪、拉贊助，和里民服務，以及管理社區申請來的易服勞動役工作者等；至於什麼是裏面的事情？則幾乎受訪者都說是社區內的志工聯絡與課程安排。但仔細檢視，這些答案其實是有矛盾的：若說接洽廠商與民意代表意味著接觸社區外的資源，那麼事實上，A 1 負責接洽縣府，維繫與縣府的互惠網絡，同樣也是對外事務；同樣地，若說社區志工管理屬內部事務，但里長負責帶領被認為具危險性的男性易服勞動役者，<sup>20</sup> 卻又被詮釋為在管理外面來的人，所以屬於外面的工作。

前述的詮釋方式，與其說里長與里長夫人有著內外分工，毋寧說是人們所依循的男女界線劃分之性別符碼體系，引導人們如何認定社區分工事務的屬性。也因為這種男女分工性別符碼體系的作用，因此在 A 社區裏，儘管有女性的社區事務負責人，但我在訪談中，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位受訪者提到 A 1 打破女性傳統角色，擔任領導者之類的評論。亦即，人們理解到的並非身為女性的 A 1 突破性別角色限制，得以與男性里長並駕齊驅、共同主事；相反地，人們反而將男性里長的存在（或說在場）做為一種對照，而賦予女性領導者的工作歸為主內。以主外、主內的對比，確立了性別隔離劃分。

20 所謂易服勞動役者是指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之宣告及罰金易服勞役，而聲請易服社會勞動者，是該社區向地檢署申請而來。根據里長的說法，這些弟兄負責綠化與清潔工作，工作內容與社區環保志工並無太大差異。

## 2. 老人會結合宗親制度所彰顯的性別隔離體系

在 B 社區，由於負責社區事務者皆為女性，因此女性理事長的領導，沒有因男性領導者的在場而被詮釋為女主內。但前述性別隔離的性別符碼體系，仍以另一種形式體現，存在於社區的社交場域以及互動網絡中。

B 社區被省道穿過，被分隔為左右兩邊。社區居民互動的聚集點有四處，甲處為社區活動中心外大榕樹下，也是位於省道右側的唯一聚集處，另外三處都在省道左側：乙處為大樹下陰涼處，丙處為社區推動景點計畫後所興建的涼亭，丁處為長久以來居民所說老人會聚集的地點。每天早、晚兩次，這四處都會有居民聚集，其中甲、乙、丙三處多數為女性，少數為男性，但丁處的老人會據點則總是只有男性聚集。

我不只一次詢問社區居民為什麼女生不去丁處聊天，但志工與居民往往理所當然地回答我：「那邊都是查埔ㄟ啦，查某人怎麼好意思進去？」此社交場域劃分，不僅表現在日常的聊天據點，每當社區舉辦較為大型活動，必須邀請民眾到活動中心參與時，甲處居民就近參加不成問題，乙、丙兩處的民眾在幾年下來的社區活動推動下，<sup>21</sup> 往往也會前往參加。但丁處的男性居民，卻鮮少出席。此明顯的性別畫分，在研究者持續的參與和訪談中，才進一步瞭解到，丁據點的性別隔離屬性並不只是展現在聊天聚會區隔上，還有其更深一層的資源結構意義。

根據理事長 B 1 以及村長 B 9 的說法，早在 B 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前，丁處的老人會便已存在。當時受縣府補助成立的老人會，只要 65 歲以上的居民、不分男女，皆可成為會員，其會員福利主要是重陽節

21 B 社區的關懷工作內容主要為在服務據點提供量血壓、醫藥衛生講座、手工藝學習等活動。而為了遷就既有的互動網絡，志工隊的負責人 B 3 自創流動服務據點方式，亦即，除了活動中心服外，也請演講者與志工們輪流到乙、丙、丁據點服務。另外，她也承繼了前任理事長留下的以食物串聯人心之策略。只要社區的課程有作點心，她便騎著摩托車將點心分送到各聊天據點。也因為這樣的勤於服務，因此即便在隔著省道的另一邊，居民仍清楚感受得到社區活動的持續推行。

禮品。此由過去留下來的敬老組織，雖然並無性別畫分，但如前所述，B 社區是一個宗親制度十分穩固的社區，老人會結合了宗親制度中的父系性別符碼體系，因此老人會的主事者，一直都是男性。<sup>22</sup> 而此深具父系特質的老人會，在 B 社區的社區發展工作興起後，由於政府重視社區必須成立各項社區活動班隊，因此老人會便被納入社區發展協會中，成為社區班隊之一，更名為長壽俱樂部，而包括以往對於老人會的補助，以及會員繳交的會費，也就一併納入社區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編制上屬社區的老人會組織，卻仍以下述兩種方式，顯示即使編制體制改變，但既有的性別界線的畫分力量卻未曾消解。

首先，儘管長壽俱樂部成為社區班隊，但其運作事實上卻完全獨立。名義上，長壽俱樂部的經費，包括向政府申請補助或是核銷等，都應該經社區蓋章、核可。但事實上，社區卻只是純蓋章而已。此獨立運作有其長期根源，這一點可從理事長以下的談話中看出：

對對對對，完全獨立的啦（指長壽俱樂部）。啊事實上是不能獨立，應該要隸屬在社區，因為縣府那邊之前也在說，就是他開會的時候也有說為什麼社區跟長壽俱樂部應該要盡量處在……就是財務什麼的盡量不要分開，可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從以前就這樣了……嘿啊，我知道的沒有幾個社區說真的有合在一起的啦。(2014.05.16)

因編制上改為社區班隊而改名為長壽俱樂部，但居民還是稱其為老人會；其不僅經費獨立運作，甚至組織本身有自己的會長，因此造成老人會既在社區中，卻也在社區之外的現象。

其次，老人會與父系宗親體制密切相關，而在重視宗親秩序的 B

22 我在訪問村長，談到此老人會時，村長指著他當選村長後，老人會送給他的匾額，上面署名的理事長與核心幹部等人名字，幾乎清一色皆為男性。村長一一告訴我這些人在村裏面的宗親關係，一再強調大家都是叔姪、兄弟輩，由此可以看出此老人會與父系宗親制度的結合。

社區裏，老人會場域中的日常聊天，也儼然形成一個村內公共事務的權威性議論處。因此即使是老人會已納入社區中，但仍是一獨立的公共事務核心場域。事實上，村裏公共事務的重要權力角色——村長，就是來自老人會的推舉。現任村長是在國營企業退休後，決定參與村長選舉，村長告訴我：他會出來選，是因為退休後幾乎每天到老人會聊天，後來世大（台語，意指長輩）點名要他出來選，他才會登記參選。這其中的父系宗親權力運作，從村長的一段話表露無遺：

就是他們鼓勵，我才會出來選……長輩很疼惜我啦！這裏的很多阿兄，都很疼我是真的啦！我從小就很窮，同儕大家就說：「啊這個就很儉（台語：節儉），如果這個來做村長，可能不會把阮村帶到那裏去啦！」我說：「不會啦，絕對不可能帶到偏差去啦！」所以如果有什麼事情的決策（指擔任村長後），我也都會請示這裏的長輩啦！我不會說我自己一個人講啦。<sup>23</sup> (2014.05.16)

由前述兩項分析，我們可以看出，B 社區丁處（老人會）的男性互動聚會，不只是互動網絡之空間區隔，其背後更牽涉社區中經費資源與權力體系的畫分。而此男性網絡在社區中所凸顯出最為強而有力之性別畫界作用，或許便展現於當男性偶爾願意越過省道，捧場女性為主的活動時，所顯示出的特殊性與例外性。前述指出，丁處的男性居民鮮少參加社區活動中心的活動，但在 2013 年父親節活動時，多位丁處男性居民竟例外前往出席，這樣的破例之舉，讓負責動員邀請的幹部 B 3，視其為重要成果，她不止一次地向我強調：

他們都有來喔。我這樣子就覺得很窩心，至少我們經營了這

23 這位村長會被長輩們選中，自然並不僅是他的節儉形象，事實上，由於他擁有同儕中少有的高中畢業學歷，所以退休參與老人會後，很快就接手協助老人會的會計工作，加上他長年任職國營企業的經歷，此二者都為他增添文化資本優勢。



麼多年，那些查埔ㄟ，竟然會來，他們本來是叫不動的喔，就是我們辦活動，他們是不願意從那邊走過來的，竟然這次我們辦爸爸節，他們還願意來。(2014.02.25)

B 3 對於男性居民破例跨界在場的驚喜反應，似乎更清楚彰顯了社區中性別畫分體系的強固性。

### 3. 男性不在場的陽性符碼特質

無論在都會型、夫妻檔共同領導的 A 社區中，或是在宗親力量仍具影響力，男村長與女理事長分別領導的 B 社區，男性的在場 (presence)，都以與女性對比的方式，確立了社區中的性別隔離。然而，進一步來看，當男性不在現場時，其不在場卻也同樣強化了陰性與陽性對照的性別符碼體系。

研究中兩社區之志工多為女性，不僅是照顧性質的關懷志工，就算是環保志工，也是女性居多。在研究歷程中，當我提到此現象時，多數受訪者的第一個反映通常是：因為男性要上班，所以無法擔任志工。但在繼續聊天中，多數受訪者會開始修正答案，因為他們注意到安排在週末的志工工作，其參與者仍以女性為多。有趣的是，當研究者進一步詢問其對此性別化現象的詮釋時，不分年齡、區域，擔任職務為何，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出了一個十分類似的解釋：男性比較愛面子，因此不喜歡擔任服務工作，也不喜歡任意接受邀請，加入群體中。

B 社區領導人 B 1 便細膩觀察到：「你叫查埔ㄟ做那種要跟人家解釋事情的工作喔，他們就會卡歹勢，拉不下那個面子啦」(2014.02.25)。而身為男性的 A 社區理事長 A 9，也認為：「男生卡愛面子吧！」這種愛面子一方面表現在服務意願不高（如 A 9 所說：我的感覺，男孩子叫他出來外面掃地什麼，他一定比較不要，本身比較不習慣做這些工作，在家都沒在掃了，還出來掃，對不對？比較會不好意思啦〔2014.05.12〕）；至於邀請男性參與其它活動，志工 A 5 也說：「男生會覺得我才不要去那裏給人家當猴戲，有的人還會覺得

說：蛤，去那裏吃飯（指社區關懷據點的中午供餐），我不要，我又不是不會賺錢！」(2013.12.02)。女性志工 B 8 則認為：「查埔卡無像咱查某，人家招了就走，卡無按呢」(2014.04.25)，B 6 更進一步詮釋：「查埔有的是查埔ㄟ個性啦，不要和你們這些查某插雜啦（台語：混在一起）」(2014.03.21)。所以儘管多位女性志工都曾經邀請先生共同參與，但只有 A 社區少數幾位先生因太太一再邀請而同行，其他的男性根據女性志工的形容大多都是：他不要出來，他甘願自己一個人在家。

在這樣的互動脈絡裏，男性的缺席被詮釋成一種保全面子、獨立自主、不受使喚的表現，<sup>24</sup> 這樣的特質正吻合傳統所謂男子氣概 (masculinity) 的展現。而此所謂男子氣概特質在社區志工行動場域中的懸缺，在社區的日常活動實踐中，又再次反向使得男性更加傾向拒絕混入，並同時強化女性對社區志工行動網絡賦予的陰性化意涵。

由性別化社會資本的觀點來檢視女性的社區參與行動，我們注意到，其參與行動所建構的社會網絡，乃透過日常操作，鑲嵌在特定性別符碼體系中，此性別符碼成為女性如何詮釋社區參與網絡，以及此網絡所可能產出之行動的核心論述來源。因此，儘管研究中 A、B 兩社區都有女性主事者，但無論是男女共同參與社區工作，或是男性在社區參與中缺席時，社區網絡都被詮釋為男／女有所區隔之象徵秩序的體現：亦即，在參與者的詮釋意義脈絡下，男性多以「例外情況才會參與社區」或是「擔任社區主事者但負責向社區外爭取資源」的意象呈現於社區網絡中，而與此同時，在陽性與陰性符碼的對照下，社

24 保全面子不受使喚的男性陽剛特質保證，不僅成為男性不參與社區的詮釋，即便在男性偶爾接受社區任務時，也是過程中要被保全的重要性質。A 3 的先生擅長印刷與統計表格繪製，對於社區來說常能派上用場。有趣的是，A 3 的先生名義上並未參與社區志工隊，但實質上卻為社區提供了相當多電腦方面的服務，之所以能夠如此，其實有賴 A 3 摸索出來的要訣。A 3 告訴我，她在參與社區前，已經有超過二十年在各非營利組織內擔任志工的經驗，但她先生從不跟她一起參與任何組織。不過她慢慢也摸索出，讓她先生願意協助的處理方式就是「我不會直接跟他說要做什么、做什么，有需要就叫她們（指組織中需要電腦協助的當事人）自己跟他說，我不敢直接跟他說，怕他反彈，他會說我還找工作給他做，可是，如果他自己願意的，他做到半夜也沒關係。」這當中顯示出當男性提供志願服務時，仍需要在保全其自主性的意義詮釋下，方得以進行。

區也做為具「姊妹們相互作伴、染陣」、「女生不怕沒面子來服務別人」等陰性特質之網絡而存在，本文稱其為「詮釋性的社區參與網絡陰性化」(interpretative feminizatio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network)。此詮釋乃扣合著既有的男公／女私，男主外／女主內，以及男自主／女依附的性別符碼而產生，因而賦予社區參與網絡具私人、家務性、相互依附的陰性象徵意涵。而這樣的詮釋傾向，不僅強化了社區志工多為女性之現象的合理性，也侷限了女性如何運用社區行動中所建構之網絡的可能性想像。如前所述，Everitt (2006) 的研究指出個人所抱持的性別角色意識型態，明顯影響著女性參與志願結社經驗所可能對個人產生的政治參與助益。與此相互呼應，本研究社區的性別符碼體系，也同樣左右女性參與社區的經驗，這或許正說明了，為何社區女性志工對於社區社會資本的運用，仍絕大多數展現於個人身心福祉提升上，而鮮少賦予其公民社會行動意涵。

## 七、小結

自 Putnam 開啓社會資本有助公民參與之研究以來，批評者相繼提出進一步關注其中潛藏的性別議題的訴求。本研究以性別觀點，探討台灣社區發展中社會資本的性別化意涵，並且為修正 Putnam 相關論述中缺乏說明社會資本所鑲嵌之行動脈絡的不足，本研究嘗試透過參與和深度訪談，以探究社區中女性參與網絡的生產與運用，以及參與者對社區網絡的意義詮釋。歸納來說，本研究發現社區之社會資本的性別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面向：

一、在兩個社區的發展行動中，以女性為主所建構的內聚型社會資本，都被引入社區中成為開啓社區行動的重要基礎。而女性成員透過持續的社區參與，亦進一步促使社區網絡與社區認同得以形成；更進一步來看，以女性為主所建構的社會資本同時被運用於建構社區主事者與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區的互惠網絡，這意味女性建構的社會資本，發揮再生產功用，使得社區向外的橋接型社會資本得以形成。所

有社會資本的形成都不是無中生有，Putnam的貢獻在於開啓系統性地檢視非正式社會互動、職場連結、宗教活動以及如社區等志願性結社如何生產出不同類別的社會資本，但引入性別化觀點的 Bezanson (2006) 指出，在分析社會資本生產時，我們必須進一步看到社會資本生產行動背後所仰賴的性別化再生產歷程。而本研究銜接性別觀點嘗試指出，除了社會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之外，在本研究的社區脈絡中，當社會資本形成後，如何得以進一步再生產出有利社區行動之社會資本的歷程，也同樣充滿性別化意涵。以上的研究，不僅肯認女性公民參與的貢獻，也有助於解釋社會資本如何在特定脈絡下轉化為參與行動。

二、儘管女性志工網絡開啓社區發展成果，但性別符碼體系卻促使社區成員將日常實踐中男性在社區場域中的在場和缺席，都詮釋為女性社區參與的對立面，因而生產出社區參與網絡陰性化的詮釋意象。亦即，當男女社區領導人並存時，女性領導者的工作往往被詮釋為只和社區內部有關，以符合男主外、女主內模式；而在父權體系宗親制度仍十分鮮明可見的社區裏，社區中的男性社交互動，不僅被視為女性不宜涉入其中的優位社會網絡，男性對社區活動的參與也被視為一種具有例外性質的越界；至於社區志工中通常少見男性，更被解釋為男性為保全面子、重視獨立自主，因而不輕易混入社區網絡的男子氣概。此詮釋性的社區網絡陰性化，意味著賦予社區網絡具有私人、非公共性、家務性，相互依附的陰性象徵，於是正當化了男性的缺席，也促使女性傾向於將社區參與網絡，視為私人伙伴情誼，因此雖有助於個人社交生活與心理健康，但鮮少賦予其公民社會行動意涵。

綜合前述來看，內聚型社會資本將研究中的女性帶入社區志工隊，不僅有助於帶動社區發展，對志工本身而言，也開啓其自身公民參與行動，並在後續持續參與中，超越原先具有排他性的內聚資本，擴充了自身在社區中（也僅在社區中）的橋接性社會資本。然而，性別符碼體制所框架出的意義詮釋，卻使其雖有公民參與行動，卻傾向賦予

私人互動的意涵。或許正因為如此，儘管社區運作乃緊扣地方政治權力脈絡，但兩社區的受訪者卻往往表示參與社區無關乎政治，顯示出其社區參與未具體發揮提升政治參與之效果。<sup>25</sup>

台灣的社區發展明顯具有理事長多為男性，志工多為女性的性別化分工。本研究選擇以女性為主事者之社區為個案所呈現的研究成果，則進一步凸顯出社區參與的性別化意涵，不僅表現在社區分工的性別隔離，更進一步內蘊著女性低度肯認與社區社會資本運用的性別不平等議題。這也凸顯出本文選擇「性別化社會資本」來加以分析女性社區參與的重要性：亦即，儘管男公、女私的性別分工概念常被用以解釋不利女性公民參與的結構因素，但僅著眼於性別分工，如此可能忽略女性如何在此分工結構下，仍得以透過建構網絡生產社會資本，對公共事務做出貢獻，也較未能看出女性如何自此參與網絡中獲得特定益處；相對地，社會資本雖被視為有益於公民參與，但忽略性別觀點，則未能指出社區參與場域中，社會資本的建構與運用機制如何受到性別分工等性別結構影響，因而在落實民主政治上有所限制。

由此看來，在未來研究開展上，一方面可思考如何回應前述議題，以提升公民參與之性別平等；另一方面，若依循本文所指出社區網絡所具有的詮釋性的陰性化特質，那麼也可以針對積極參與社區的男性志工進行探究，分析其如何看待在此陰性網絡中的自身男性身分實踐，或許對於社區社會資本的性別化將可以提供不同面向的詮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前述，本文雖強調以女性參與經驗，回饋修正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之相關理論，但本文以女性志工的參與經驗

---

25 一個重要例外是B社區的前任理事長B4。研究結束後某次回訪時，我嚇然發現B4決定參選村長。六十多歲的B4在她的世代裏，是該村極少見未踏入婚姻的女性。先前訪談時，她曾談到，很早就決心不嫁，所以幾十年前就省吃儉用為自己買了房子，因為「我想說既然決心要走這條路啊（指不走入婚姻），就要有準備」（2014.04.07）。該次回訪，我也見了村長，聊到選舉時，代表宗親力量並將競選連任的村長告訴我，他不擔心B4的競爭，提到B4既沒有結婚，又沒有兒子，又是外姓，並強調在當地選舉，宗親仍最重要，說道「阮姓X的佔百分之七十ㄟ，還選輸給人家，真的要笑死人了」。B4後來以大幅票數差距落選，但她的非傳統性別角色實踐，呼應著她例外地將社區參與轉化為政治參與，或許更印證本文所指出，性別符碼體制框架著女性如何詮釋社區網絡的論點。

為主，行動脈絡也屬於高性別化的社區發展場域，亦即，其所指涉之行動類型與場域性質皆具特定性，因此所提出的理論修正，是否適用其他公民參與網絡，仍有待探究。

誌謝詞：本研究之進行有賴科技部支持，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3 -038。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與編委會的意見提供，修正完稿後，重新讀來，確實感受到各項建議讓論點更為周延、清晰。文章的完成，深深感謝對研究抱有高度熱情的黃惠琴同學在資料蒐集彙整上的協助。此外，由於訪談內容多以台語進行，因此也要謝謝高雄市三民高中蔡新南老師以及個性四海、妙語如珠的黃竹雄先生提供台語諮詢。這些協助是本文寫作的重要基礎。當然，仍有的不足，自應由作者負責。

## 參考文獻

- 方孝謙，2008，〈社會資本與社區營造：比較林邊與北投〉。《社會科學論叢》2(1): 127-164。
- 王惠元，2000，《公領域中女性傳統家庭角色的影響與再複製——以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女性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昌泰、洪鴻智、陳金貴，2002，〈建立市民導向的社區參與制度：北市經驗的評析〉。《行政暨政策學報》35: 1-44。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社區發展統計（<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446&CtNode=4641&mp=1>，取用日期：2014年8月17日）。
- 吳明儒、陳竹上，2005，〈台灣社區發展組織政策變遷途徑之探討〉。頁130-168，收入李天賞主編，《台灣的社區與組織》。台北：揚智。
- 吳幸蓉，2007，《女性社區工作者增權展能歷程之研究——以高雄縣婦女館婦女教育方案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宛澍，1996，《女人的網絡建構女人社區解讀——台北縣袋鼠媽媽讀書會個案》。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清如，1996，《社區中的性別政治——國家的社區政策與女性的社區參與經驗》。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育芳，1996，《婦女社區參與和現代母職的實踐：以主婦聯盟的社區運動為例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証揚，2011，《女性參與社區照顧經驗之探究——以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居家陪伴員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恒鈞、劉逸雅，2009，〈社會資本與都市再生計畫推動之關連性：以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再生計畫為例〉。《台灣民主季刊》6(4): 49-99。
- 傅仰止，2005，〈社會資本的概念化與運作：論家人重疊網絡中的「時間投資」機制〉。《台灣社會學》9: 165-203。
- 黃源協、劉素珍，2009，〈社會資本對台灣社區發展之政策意涵〉。《行政暨政策學報》48: 155-192。
- 黃源協、劉素珍、莊俐昕、林信廷，2010，〈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關連性之研究〉。《公共行政學報》34: 29-75。
- 楊金燕，2002，《以「褪」為進：921災後中寮巧手植物染婦女自主產業之經驗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美鑽，2006，《女性領導人社區參與學習歷程之研究——以賦權增能觀點論

- 析》。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景輝，2009，《社區工作：理論與實務》。台北：巨流。
- Ackelsberg, Martha A.. 2005. "Women's Community Activism and the Rejection of 'Politics': Some Dilemmas of Popular Democratic Movements." Pp. 67-90 in *Women and Citizenship*, edited by Marilyn Fried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dkins, Lisa 2005. "Social Capital: The Anatomy of a Troubled Concept." *Feminist Theory* 6(2): 195-211.
- Alfred, Mary V.. 2009. "Social Capital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Women's Networking and Learning." *New Directions for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122: 3-12.
- Arneil, Barbara. 2006. "Just Communities: Social Capital, Gender, and Culture." Pp. 15-43 in *Gender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Brenda O'Neill and Elisabeth Gidengil. New York: Routledge.
- Bezanson, Kate. 2006. "Gender and the Limits of Social Capital."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3(4): 427-443.
- Buegel, Irene.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Feminist Critique." Pp.4-17 in *Women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Jane Franklin. London: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 Erickson, Bonnie. H.. 2003.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ed Social Capital in Canada." Pp. 27-50 in *Crea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A New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Henk Flap and Beate Völker. London: Routledge.
- Everitt, Joanna. 2006. "Gender-Role Orientations and the Conversion of Social Capital into Political Engagement." Pp.273-292 in *Gender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Brenda O'Neill and Elisabeth Gidengil. New York: Routledge.
-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1360-1380.
- Halpern, David 著，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社會資本》。台北：巨流。
- (Halpern, Davi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Hodgkin, Suzanne. 2009. "Inner Wheel or Inner Sanctum Gender and the Social Capital Debate."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4(62): 439-452.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ster, Ruth. 2005. "Feminist Citizenship Theor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Understanding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Lives." Pp.18-26 in *Women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Jane Franklin. London: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 Lowndes, Vivien. 2004. "Getting on or Getting by? Wom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 Particip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1): 45-64.
- Molyneux, Maxine. 2002. “Gender and the Silences of Social Capital: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3(2): 167-188.
- Norris, Pippa and Ronald Inglehart. 2006. “Gendering Social Capital: Bowling in Women’s Leagues?” Pp.73-98 in *Gender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Brenda O’Neill and Elisabeth Gidengil. New York: Routledge.
- O’Neill, Brenda. and Elisabeth Gidengil. 2006. “Removing Rose Colored Glasses: Examining Theories of Social Capital through a Gendered Lens.” Pp.1-14 in *Gender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Brenda O’Neill and Elisabeth Gidengil. New York: Routledge.
- Porte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Sapiro, Virginia. 2006. “Gender,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s.” Pp.151-184 in *Gender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Brenda O’Neill and Elisabeth Gidengil. New York: Routledge.
- Stolle, Dietlind and Michele Micheletti. 2006. “The Gender Gap Reversed: Political Consumerism as a Women-Friendly Form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Pp. 45-72 in *Gender and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Brenda O’Neill and Elisabeth Gidengil. New York: Routledge.